

November 2015

On Liu Shipei's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hina's Literature"

Jian W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u, Jian. 2015. "On Liu Shipei's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hina's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6): pp.102-10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6/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文质”与“南北”：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探析

吴 键

摘 要：本文认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作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依循着一种理论视角，将南北之分视为超越于历史的先在框架，依此展开对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与将文化、文学的南北之分视为历史特定阶段的传统南北论述之间存在着范式上的断裂。但同时刘氏此论在现实关怀与学理逻辑的纠葛中，并未贯彻其文选派宗旨，在“文/质”对立之中给予后者以更多同情，在与彼时思想史、政治史的密切互动之中，呈现出一种溢出文论史的暧昧性与复杂性意义。

关键词：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文质；范式

作者简介：吴键，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电子邮箱：wujian2014@pku.edu.cn

Title: On Liu Shipei's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hina's Literature"

Abstract: Tradi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hina's literature were made on historical specificities, while Liu Shipei in his pioneer essay in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hina's Literature" took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at viewed the distinction as an ahistorical literary framework *a priori*. Liu's argument may be read as a point for a paradigmatic breakup, but Liu did not push forward his idea in his practice. Instead, he attached more weight to the essence (*zhi*) over the literary (*wen*) in this traditional pair of concepts, and his contribu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intellectual-political history, was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scope of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Liu Shipei;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China's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s the essence (*wenzhi*); paradigm

Author: Wu Jian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Art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with academic focus on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 Email: wujian2014@pku.edu.cn.

一、引言

清末民初，一方面由于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传入，一方面基于本土学人力图通过“土地”认同来构建国族意识的需要，地理与民族、地理与学术的论述一时间甚嚣尘上。在此时代思潮之中，“文学与地理”也成为彼时文论中的重要话题，并赫然列于学部颁布的作为“中国文学门”教

学大纲的“中国文学研究法”之中，从而作为一种主流话语进入了教育再生产（璩鑫圭 唐良炎 364）。在这些文化与地理、文学与地理的论述之中，“南北”划分作为最为常见的一种模式，不仅架构了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名篇，而且也成为稍晚时候文学史与文论教材的知识范式之一。

在其中，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无疑是

突出的一篇。在批评家李长之看来,如果将“中国的新文艺批评”界定为“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印象式的,片断的批评,而入于近乎西洋的,体系的,成其为论文的批评言”,那么其源头可以推至民国以前,其代表就是刘氏此文以及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 514)。而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与传统的“南北”文学与文化论述之间,有着思想上的传承,但更存在着范式上的断裂,在这一断裂之中,蕴含着中国现代文艺批评之“现代性”所在。同时,刘氏此论又有着溢出于文论史的重要意义,而与彼时的思想史、政治史之间有着密切互动,不仅接续着南宋以至晚明以来用“南北”区分“华夷”的前现代民族主义言路,^①而且也吸收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以“地理决定论”理解文明的西方理路,而这些层面无法被单纯的文学现代性所含纳,从而在与历史和政治的纠缠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与暧昧性。对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这两个维度加以描摹与阐明,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二、古今“南北”文学论述的范式断裂

传统上以“南北”梳理中国文学乃至学术流别的话语论述,往往只是对一时一代的文学现象与脉络进行印象式的把握,而非像《南北文学不同论》以之为贯通了上古未有文字之时以至于作者所立身的清代这样一个“全时段”的结构。^②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之中,将“南北”视为一种先在的结构,在其看来,自上古未有文字之时,在歌谣等口头文学之中便已存在这一种对立:“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谓涂山歌于侯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345-46),古代语音分为“南音”与“北声”,而这种语音之差异正源于风土地域的差异。其祖刘毓崧曾参与杜文澜主持的《古谣谚》辑录工作,而乡中先贤黄承吉的“义起于声”的“右文说”也为其所拳拳服膺,重视文字的声音属性、强调书面文学的口头文学“前身”一直是刘师培理论框架的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视阈之中,文学在其“史前史”之中便已经先在地具有了“南北”的分野。只是上古歌谣传世数量稀少,并不能从中提炼出风格的具体差异之处,于是刘氏笔锋一转,“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346),之后却并非就声音之

殊与文学之别立论,而是直接转向了地理环境决定的论证思路: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抒情言志之体。(346)

其中,刘师培沿着“风土—民性—文风”的思路,确定了文学“南北”在“实际/虚无”“记事析理/抒情言志”之间的差异,并在此框架之下展开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梳理。上文“音分南北”的历史描述与此处“风土—民性—文风”的理论论证,使得“南北”分野作为文学史的先在框架,不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实然”,同时也成为了一种理论性的“应然”。但在此,要首先加以辨析的问题也许是,作为文学论述框架的“南—北”之分,是否真如刘师培所言是如此的无证自明呢?如果将常言常道的“南北文学不同”的论述视为一个话语整体,这一话语究竟于何时成型,而在刘师培这里又经历了怎样的传承与断裂?如何能发现其中的罅隙所在,描述其中的“知识活动与门槛”:“它们中止知识持续的积累,打断知识缓慢的发展,而迫使它进入一个新纪元,切断它经验的源头与其原始的动机?”(米歇·傅柯 70)

在此,可以从田晓菲对南朝梁文学的相关研究来展开讨论。她认为在中国“南北”文化想象中,北方被视为粗犷、豪放、严峻,而南方则温柔、旖旎、充满感性,这并非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在南北朝时代逐渐形成的文化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到公元6世纪基本成熟,在南北统一的隋唐时代最后定型。这其中涉及作为彼时南北方对峙政权的文化政治运作,南人出于政治需要,将北方的形象塑造为蛮荒、朴野、自然,以求突出南人之文明,自居于“文化/文明”(culture)的代表,置北人于“自然”(nature)的地位。但“自然”(nature)本是一个可褒可贬的范畴:从否定方面来看是粗鲁野蛮,从肯定方面来看则是质朴天然。最终,作为北方王朝的隋唐统一了中国,从而因应着原有的话语概念,消解了“质”之中“野蛮”的义项,强调了其道德上的纯洁与严格,从而取消了“南/文”这一对立项的特权地位(田晓菲 238-44)。

而南北文学话语成型的标志即是《隋书·文学传序》，其中关于南北文学风格的界定、南北文学发展流变的叙述与评价具有范式地位，后世所论，实际上并未出其矩矱：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后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魏征等 1163-64）

其中界定南北文学风格为“清绮”与“贞刚”，“文华”与“理深”，重“音韵”（“宫商发越”）与重“气质”，“宜于咏歌”与“便于时用”之间的对立，同时作为北方政权以正统儒家立场抨击南朝特别是梁陈两朝文学为“新巧”与“淫放”，“雅道沦缺”“渐乖典则”，都奠定了后世相关论述的基调。对于其所论述的南北文学之不同，不仅可以从历史发生的角度阐明其中的建构性，而且也可以将之与当时的某种文学实际进行参证比较。如唐长孺就指出，北朝文学家邢邵、魏收、温子升是否卓然成派，以与南朝沈约、任昉、江淹并举，就是很可质疑的。魏收与邢邵曾经互指对方抄袭任昉与沈约，而温子升则继承魏晋齐梁一脉文风。因此，此时“北之与南乃是师承关系，而非相互争雄”。而到了北朝末期，《文学传序》所指为“淫放”“轻险”的徐、庾代表的江左文风基本上占领了北土文坛，

宇文泰努力造作的规摹典诰的文体及身而绝，而被诋斥的南朝文风却盛行关中，彼时文学发展的实相也许如唐长孺所说，“北土文学的重振实际是南朝文学的北传”。这一时期的文学态势与其说是一种共时的“南北”对立，而毋宁说是一种历时的源流关系。因此，以“南北”为框架结构中国文学脉络，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即使对于与这一框架也许最为切合的南北朝文学，以此来把握其源流依然是需要思量再三的（唐长孺 319-48）。

《隋书·文学传序》作为南北文学论述的范式之作，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自然从中汲取了诸多资源。如从南北对立、文质对举的基本框架，站在正统儒家立场对南朝文体加以抨击的道德口径以及对于一些文学家的具体评价等，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但二者之间却有着一个基本的裂隙，也即在《文学传序》之中，南北文学的分野被视为统一的源流脉络所衍生而出的，也即南北文学的对立被限定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宝之间”以至隋文帝改革文风之间，而这一对立上接的是“张、蔡、曹、王”所代表的汉魏文学正统，以一种历时的脉络含纳了共时的结构。但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之中，这一分野是先存的，贯穿了文学史发展的终始，以一种共时的结构收摄历时的脉络。这之间并非只是所处理对象的“量”上的差异，而是不易察觉的范式上的转移。

在《文学传序》之中，其时南北文学分立上承统一文学传统，不仅是关于某种历史“实相”的叙述，而且也是由叙述话语的自身机制所决定的。因为正是在这种“征圣宗经”的正统论框架之下，对南北文学加以轩轻抑扬的评价标准正在于二者中究竟何者真正接续着“传统”。这种论述框架在对南北文学的仿佛持平之论中实际上暗寄心香于“词义贞刚”“便于时用”的北朝文学，同时在“返于古”的价值取向之下，抨击梁陈文风悖离传统的文学“典则”，沉溺于追求“新巧”，导致圣贤“雅道”亏缺，才真正能够获得其话语力量。也即在传统的南北文学论述之中，一元的文学源流总是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仿佛作为权威的“父亲”裁定着分离的文学派别之中何为宗嗣、何为从子。

对此，还可以结合同样给予刘氏此论以很大影响的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来加以辨析。阮元作为乡中先贤，刘师培对其所著此论

了然于胸,《南北学派不同论》的命题立意亦可见出对于阮元此论的致意。但进一步对比二者,却可以重新确证上文所说的裂隙。

随着清代金石考辨的深入,金石书法的价值逐渐被包括阮元在内的学人所认识,并与当时作为书法主流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一脉传承的“帖派”书法抗衡,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为“碑派”书法正名。在《南北书派论》起始,阮元便指出臧否然否的标准,也即“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的复古论(阮元 591),并描画出南北书派的谱系,也即由共同的源头钟繇、卫瓘发端,由王羲之、献之、僧虔以至智永、虞世南而形成南派,由索靖、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以至欧阳询、褚遂良为北派。南派虽然“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阮元 591),但是在南派书法中“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阮元 591)。只有北派书法虽然“拘谨拙陋”,但古法犹存。然而自唐初始,“王氏一家兼掩南北”(阮元 591),至“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阮元 591-92),到了“元、明书家”更是认为《兰亭集序》之外更无书法,南派书法实际上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

但在复古论的框架之下,南派书法这一由来已久的艺术实践被视为对汉魏古法的背离而被取消了合法性,而书法正途在于“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使得“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阮元 596)。在此可以看到,阮元之所以能够如此强悍地截断原有的书法发展主潮,断然否定帖派书法的价值,从而促成艺术实践领域的革命性转变,却正是借力于“复古论”叙述强大的合法化效力,而这一效力更深地植根于“返本复初”的传统循环时间观与历史观之中。在这一套叙述话语之中,“源头”被追述与构建起来,通过“溯源”将当下或保守或激进与实践与之建立联系,从而实现由边缘向“正统”的迁移。在此,“源头”必不可少,因为它保证了了对立项(“南/北”)的秩序差异。

但反观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南北”并非是由一元的“源流”分裂而来,而是在学理逻辑上便是“先在”的。在此并非时间容纳着空间,而是空间结构着时间,文学的“南北”分野并非被视为历史流变而形成的,而是从普遍的学理逻辑出发而成立的,也即这种“全时段”文学史的

南北对立是经由某种“理论”目光而得以成立。“南北”不再被视为与某一历史阶段相联系,而是经由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的“风土—民性—文风”论证成为普遍性框架贯穿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北文学不同论》被李长之先生视为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并列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发轫之作,而确富一种“现代性”。但如果进一步将现代文艺批评的特征定义为接受“西洋”的“文学观念”的“彻底”,“运用西洋的文学”的“纯熟”,了解“一般世界文学知识上的充分”而言,这种“现代性”无疑又是暧昧的(李长之 514)。但也正是这种暧昧性,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刘师培文学观念的复杂层面。

三、“文/质”纠葛中的暧昧现代性

虽然刘师培并未采用传统的南北文学论述中以复古为旨归、以时间消融空间的叙述框架,而是从地理环境决定的理论逻辑出发,较为彻底地以“南北”的空间框架建构历史脉络。但其具体的文学史观点与论述,却与传统资源更具亲缘关系。与传统的南北文学风格界定一致,刘师培也大致沿用了南“文”北“质”,南方文学“铺张”“纤巧”“清绮”“骋词”,北方文学“简直”“雄健”“遒劲”“平实”等风格范畴,如田晓菲所说,这些风格范畴可以概括为男性风格与女性风格的对立,对此,刘师培隐隐然左袒北方文学的男性风格。如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叙述之中,刘师培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态势是“文体由北趋南”:从建安开始,曹植词赋接续宋玉,嵇康、阮籍诗歌上承庄周,左思诗赋追随苏秦、张仪,由此“北方文体,自此始淆”,而降至六朝,“梁、陈以降,文体日靡”,“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质”,而后沈炯、王褒“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六朝文体自此稍更”(刘师培 349-51)。

这样的论述基本上沿袭了《隋书·文学传序》的言路,将这一时期文学风格“由北趋南”视为走向柔靡与堕落的过程,仅由北方文人坚持质朴雄健之作来得以救赎,这里的观点不仅与刘师培一贯坚持的“骈文正宗”的观点有异,而且也缺乏其后期文学史名著《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对六朝文学的“同情”。而这里对“南/北”“文/质”的轩轻抑扬,也正构成了《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现

代特质”的暧昧所在。对此,不妨先对刘师培“文/质”观念与南北文学话语,在近代文学观念转型中的纠葛进行一个较为深入地申述。

如前所说,“南文北质”是对南北文学风格最为基本的判断,而“文/质”观念是中国思想史之中非常重要的对立范畴之一,并且由于在不同的层次上言说而被赋予多样的含义,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样态。如就“文”而言,如刘师培所概括的:

中国三代之时,以文物为文,以华靡为文,而礼乐法制,威仪文辞,亦莫不称为文章。推之以典籍为文,以文字为文,以言辞为文。其以文为文章之文者,则始于孔子做《文言》。盖文训为饰,乃英华发外,秩然有章之谓也。故道之发现于外者为“文”,事之条理秩然者为“文”,而言辞之有缘饰者,亦莫不称之为“文”。(282)

即“文”的本义训为“饰”,有文字文章、文采文藻、礼仪文明等多个层面上的含义;而“质”训为质朴、质地,正与“文”形成辩证否定的结构关系,并且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进行着意义的再生产。

就“文学”层面而言,“文/质”之争的纠结点往往是文学内容功用为先,还是形式文采为先的问题,而近代文学观念则是后者对前者的克服之中而产生的。也即,前现代的实体理性分化为现代的认知—工具、道德—实践、审美—表现三个领域,而审美现代性正是在对前者的分立与自律之中而得以成立,表现在文学观念层面即是“文学”由“以经史之学和汉诗文为中心的(优秀)的‘文章’”(铃木贞美 103)、由承担着“经国之大业”功用的位置,收缩为一种力图分立于认知与道德领域、以“审美自律”为旨归的近代含义。

在进化论的时间框架下,当“文/质”这对理念被赋予“南北”文学的身体,并使之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展开,似乎可以很自然地近代文学观念的演进打开一个突破口,而正是彼时日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大致思路。如曾教授王国维日文与西学的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就在其著作《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中说到,南北双方,无论是思想、文学性质,都表现出很大差别,北人重实际,文

学是政治道德的运用;南人重理想,文学华胜于质,大要比之“真情”的发露,更是“美感”的产物。稍后的日人文学史著述,虽然沿袭藤田丰八的观点,将北方以儒教为根本的实用的文学观念与南方文学对立,但也依据近代文学观念的逻辑对南北文学的特征进行规整,越来越将“不许自由表露情感”作为北方文学的表征。如此,近代文学的观念与价值如“文华”“情感”“美感”被投射到了“南方文学”身上,而北方文学则逐渐在这种文学史框架之下成为一种惰性与束缚的因素(陈广宏 451-80)。文学史发展的逻辑被逐渐单一化为南方文学摆脱北方束缚,走向现代转型的过程,由此就能理解,为何日本早期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对北方文学多采取一种截然否定的态度。在近代文学观念的观照下,日人对“南北文学”之间的抑扬轩轻由原来的“褒北贬南”变为“褒南贬北”。

而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南/北”来结构中国文学史,一来并没有将之放置于这样一种黑格尔式的、将空间地域的差异转化为时间上的线性序列的进化论框架之内,从而改变原有的“南北”文学格局;二来也没有凸显“以彰彰为文”“步武齐梁”的“尚文”的文学观念,通过改变传统“褒北贬南”的论述口径来为“骈文正宗”观张目。而是在“文/质”之间更为倾向于后者,暗寄心香与北方文学雄健质朴的风格,而对“六朝文体”的文藻雕饰也依照传统言路进行批判,这正构成了刘氏此论的“暧昧性”与“保守性”,不免让希望从中找出“突破传统的新见解”的研究者感到失望。但无论是以“暧昧”或“保守”目之,实际上都已经是在设立了“方向”与“目的”的后见之明,但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特异性其实正可以展示彼时时势与知识相纠结的复杂面相,及其文学观念的丰富层次。

首先在刘师培整体的文学史观之中,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并非是一个以近代文学/审美发展为目的的单线进化史。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就文学载体的语言(语体)来说,是文趋于质、由简趋繁的过程,也即由骈文俚语向散文单语发展,由文言向俗语白话发展。而由文学发展的态势来说,甚至是退化的,在《论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就说“近代文学”(自宋代尤其南宋以来的文学)大不如前,而原因正在于文与学的二分,文人学无根柢

而徒能舌其巧慧,而学人则为文乏采趋于偏枯。并且在这样一种二分之一之后,以“学”代“文”,以语录为文,以考据为文,“文”与“学”失去了整全性,刘师培在此实际上把握了一个长时段的文学态势,就其中趋于独立的“文”而言,重要的并非进一步明确其独立,而恰恰在于如何“文”得其“质”,以恢复整全性,但如果以西方近代文学观念加以比量,似乎只能为之遗憾(刘师培 126-30)。

同时,对于刘师培而言,近世文学的衰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异民族的侵入,如其所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352),元、明、清三朝在其看来正是文学低谷期,这一时期唯一为刘师培所激赏的是明末士人诗文,“至于明季,几社、复社之英,发为文章,咸感愤淋漓,悲壮苍凉,伤时念乱,音哀于子山,气刚于同甫。虽间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善苏、张、屈、宋之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遗民佚士,卷怀故都,或发绵渺之文,或效轶荡之体,咸有可观”(352)。这里与其说是推许明季士人诗文,不如说是推许诗文之后的悲哀苍凉、质朴雄健的士风民气。在《清儒得失论》中,刘氏概括明清两朝士风民气为“明人多行”而“清人多病”。有明一朝,虽然“屈辱臣节”,对士大夫不加优容、多有折辱,但“烈士殉名,匹夫抗愤,砥名砺行,略存婞直之风”,至于明廷覆亡,士人能“上者殒身湛族,百折不回;其次亦笃守苦节,洁身远引。荐绅效贞,士女并命,喋血断脰,鼎镬如饴。下逮氓隶,志节嶙然。天命虽倾,其所披泄,亦足伸浩气于天壤”。而清人则“操行弗逮”“觊颜仕虏”,上者能潜心汉学,“以学自隐,耻事干谒”,而下者则醉心词章、经世、理学,以媚世俗而致功名(139-50)。

在刘师培看来,在异民族统治之下,汉族应该破除这样的闷闷士风,提振熔铸以至于雄健刚强,因此在《南北文学不同论》的篇末,对此一唱而三叹:清代诗文虽然“派别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故观乎人文,亦可以察时变矣”(352)。刘师培关心的与其说是“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的“人文”表象,不如说是这一表征之下的“时变”。

而“雄健”的风格标签正是被系于北方文学之下的。自南北朝以致隋唐的南北文化话语建构之中,北方就与尚武、雄健、质朴等一系列男性风格相联系,而这一风格正是彼时处于另一个“新

战国”时代的汉民族所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北/质”因应着历史语境被赋予了一种新的价值。同时刘师培所吸收的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知识,也成为这一“南/北”“文/质”话语建构的重要层面。在《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之中,刘师培吸收甄克斯《社会通论》的相关观点,建立了“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分期,认为处于图腾社会的上古之民,“种与种战,族与族争,日寻干戈,祸无宁日,死生之机,千钧一发。欲争自存,不得不筹自卫;欲筹自卫,不得不习戎兵”,自个人、家族以至社会、国家都以尚武为主,而士农工商无一不出于兵(刘师培 306-17)。但刘师培如此调动其宏富的经史学储备,绝非仅仅为了确证某个西学观点,而是深具“预流”之意:

是以知整军经武,实为先王立国之本矣。故五行之数,金为首列。而黄帝继兴,遂能屏斥苗黎,扩恢疆土,宅国神州,四夷八蛮,罔不率服,以振大汉之天声,则先王尚武之效也。无如三代以降,戎翟凭陵,武功不竞,战北之羞,书于史册,而武健之风,曾不一睹。致尚武之民,流为怯懦,使非人人尽返其服兵之责,将何以挽积弱之风哉。(刘师培 316-17)

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之中,世界虽然处于由“质”趋“文”的进化历程之中,但处于进化之初的阶段却非一无可取,远古先民们的武健之风正可以“振大汉之天声”(刘师培 316),应对当下深重的民族危机。由此也就能理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之中,何以一反“文章之必以彪彰为主”(舒芜等 533)的“尚文”主张,而极力推许北方文学,并在篇末对有清一代“雄健之作”难以为继的慨然三叹。

在这样一种“南/北”“文/质”之间的抑扬轩轻正体现了刘师培现实关怀、政治决断与学理逻辑、文学观念之间的纠葛。“文/质”之“质”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含义,不仅是进化论史观中的“原始”与“野蛮”,也转喻为道德上的“洁净”与“严格”,同时在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话语中被表达为先民的“血性”与“尚武”,并融合正统儒家文

艺观中对“功用”与“内容”的强调,这些各不相同、甚至互相抵牾的观念共同汇聚于刘师培的文本表层之下,使得在对文学史的叙述无法被简单归并为单线的文学进化论,而是在历史与知识的纠缠之中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结 语

时当清末民初,随着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矛盾淡出历史舞台,以及统一同质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时期原先由“正统论”“夷夏观”所构型的“南北”论述从高度政治性的话语实践,经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等西方“科学”理论结合而变为现代学科体制下的一种知识。“南北”之分,如梁启超所说“数千年南北相竞之大势,即中国历史之荣光”(梁启超 256),成为民族国家对自身的历史与“荣光”的确证。而“文学”也由“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转为身处现代学术分工之中独立于认识、道德领域的审美表现事业,成为个体情感与创造力的结晶。在这一阶段“南北”与“文学”互相确证,铆合成为一种现代学科知识。

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言“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就被掩盖起来”(12)。《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年)将“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列于“研究文学之要义”的纲目之中,从而将南北文化与文学论述纳入现代知识再生产机制之中。在此,无论是“文学”还是“地理”都已是掩盖了自身起源的现代认识装置,依此目光而成立的正是作为“知识”的南北文学论述。在此,也许并无必要在两种论述之间强加轩輊,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代替这个透视远景提示另一个别的远景(如‘反现代’主义那样),我们只需要注视使这个远景成为可能,且被视为无可质疑不证明自明的那个装置”(柄谷行人 146)。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以其过渡阶段的暧昧性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凝视的焦点。一方面刘师培因其“种族民族主义”的革命立场,以其南北论述接续与发挥了南宋到晚明以来在“正统论”“华夷观”构型下的话语资源;同时,在其文学论述之中并未简单地依其立场“抑北扬南”,而是推崇北方文学的质朴雄健、便于时用的风尚,以此补

救时势危局。另一方面,《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南—北”藉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论眼光而得以非历史化与自然化,成为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史全幅的大框架,而这正展开了南北文学论述去政治化与“知识化”的脉络。同时,刘师培作为晚清崇尚骈文丽藻的“文选派”健将,在近代文论研究中往往作为经学向近代“文学”(“纯文学”)转变中重要一环,^③但《南北文学不同论》的文学观念却并未贯彻其“文选派”观点,而是与时势因应之间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样态。可以说,《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充满了话语的罅隙,而对于这些话语罅隙的凝视,使得我们更易看清作为空间秩序调配的“南北”与作为现代知识的“南北”之间的纠缠与转化。

注释 [Notes]

① 刘师培的“南北”论述与相关前现代民族主义言路之间的联系,可以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172-85。

② 对于中国文化南北差异的论述由来已久。在先秦时期,《孟子·滕文公》记载孟子言,说道“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闻或之先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260。《中庸》言“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朱熹 21)。汉代时,产生了从地域风土来细致考察地方民性的论述,如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虽然是按照更细致的地域(如“关中”“三河”“郑、卫”等)划分作为框架,但其对各地域的论述,还是可以看出南北地域各自的共性,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系联归并入南北以见其同(266-68)。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则被程千帆认定为是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渊源所自(参见程千帆《文论十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1-13。在其中通过《诗经·国风》诸诗篇与地域相联系,观风知政,颇有文学社会学色彩。而至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政权对立,所以南北民风、文风之对比的议论颇多,如《北史·儒林传》所说“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709。隋唐一统,《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南北文体不同的论述更是奠定了传统南北论述的基调。后清代王鸣盛在其《蛾术编》卷二中专门论述“南北学尚不同”,其中以南北对立的叙述方式系统整理两汉以至南北朝的经学脉络,界定南北民性,认为“南人轻浮浮躁,北人沉潜笃

实。南人虚夸诞妄,北人诚朴谦逊”(王鸣盛《蛾术编》,顾美华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2,5。而后阮元的《南北书派论》更是给予刘师培以直接启发。综上所述,以地域“南/北”划分文学与文化有其重要的传统思想资源。但在传统论述中,更多只是作为对一时一代的文化、文学现象的印象式把握,而非像包括《南北文学不同论》在内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将之作为整体框架对中国文学与学术做全时段、系统性、专题性的研究。如陈序经在其《南北文化观》中仔细梳理了先秦以至近代梁启超的南北论述后,就认为“继梁任公而研究中国南北学术的不同者,有刘光汉氏。刘氏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发表于乙巳(一九〇五)年的《国粹学报》第一年。他这篇文章长约二万言,严格来说,对于这个问题的专题研究,刘氏恐怕还是最先的人。我们在第一章里所叙述的各代学者南北文化各方面的对比,甚至梁任公的著作里,也找不出一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文章”(陈序经“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3.3(1934):44)。

③ 详细可参见王枫“刘师培文学观的理论资源与论争背景”,《学人》13(1998):265-94;董瀛《刘师培的美术观》。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马睿《从经学到美学:中国近代文论知识话语的嬗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59-84。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Karatani, Kou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 Zhao Jinghu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陈广宏“泰纳的文学史观与早期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构建”,《卿云集续编——复旦大学中文系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51-80。

[Chen, Guanghong. “Taine’s Viewpoints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rrative Model of Earl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Qingyunji Xubian: Memorial Papers of the 8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5. 451-80.]

梁启超《新史学》,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Liang, Qichao. *New Historiography*. Eds. Xia Xiaohong and Lu Y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Li, Changzhi. *Collected Works of Li Changzhi*. Vol. 3.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6.]

刘师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李妙根编。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

[Liu, Shiwe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iwei before 1911*. Ed. Li Miaogen. Shanghai: Zhongxi Press, 2012.]

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Li, Yanshou.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舒芜等《近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Shu, Wu, et al. *An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9.]

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Suzuki, Sadami. *The Concepts of Literature*. Trans. Wang Che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1.]

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1993年。

[Foucault, Michael.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David Wang. Taipei: Rye Field Publications, 1993.]

璩鑫圭 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Qu, Xingui, and Tang Liangyan, eds. *A Collec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School System*.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7.]

阮元“南北书派论”,《擘经室集》,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591-96。

[Ruan, Yuan. “On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School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Yanjing Shi Ji*. Ed. Deng Jingy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591-96.]

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唐长孺文存》,朱雷、唐刚卯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319-48。

[Tang, Zhangru. “On the Northward Spreading Of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ang Zhangru*. Eds. Zhu Lei and Tang Gangmao.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6. 319-48.]

田晓菲《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Tian, Xiaofei.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魏征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Wei, Zheng, et al. *The History of the Sui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责任编辑:查正贤)